

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

陈 兵

宗教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是否应被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这是一个为国内外宗教界人士和有关社会人士从不同角度予以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在国内思想、学术界大体已有了共识。如《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中所说：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所谓协调，指的是不相同的因素之间互相适当的配合。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础，是信教者和不信教者共同爱国守法，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国家能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协调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关系。这个基础，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发展，就宗教界和政府两方面来说，在当今无疑已相当坚实巩固。政府从立法、行政管理等方面，切实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宗教界也在不断谋求改革，发扬优良传统，扬弃消极因素，力求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使教法的弘扬起到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宗教这种寿命最为绵长的社会意识形态，虽不无其永恒的主题，但自诞生以来，无不在适应社会发展而有所变革。佛教尤以具适应性、包容性著称。要求弘法者“契理

契机”、“应机说法”，是佛教传统的弘法基本原则。从本世纪初起，佛教界的进步人士便为使佛教适应社会而作了种种努力。当代佛教之适应新形势，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除了表现在各宗教所共同的将爱国与爱教统一，提倡教义中积极性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以号召教徒弃恶行善，为国家建设、人民利益作贡献，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保护宗教文物，进行宗教学术研究，开展与海外宗教界的友好往来，从而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还表现出中国佛教渊源于自身传统的、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突出特点，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人间佛教”的提倡

在近代的社会革新风潮中，佛教界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改革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佛教所形成的消极厌世、“重死度鬼”的弊病，进行了反省批判，主张佛教本来以人间为本的精神，推行“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以现实人生的发达为佛法之本。1934年，《海潮音》曾出“人间佛教”专号，以后又有《人间佛教》（星洲）、《人间佛教月刊》发行，太虚法师出版过《人生佛教》的专著，台湾印顺法师等对人间佛教思想作

了进一步发挥,人间佛教的倡行,成为中国佛教在现代社会弘传的大势所趋。

解放后,佛教界人士进一步发扬太虚法师等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号召教徒把实现“人间净土”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相结合。佛教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都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和发展。1983年,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系统总结佛协三十年工作的基本经验,把应机弘法的方针总结为提倡“一种思想”——“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以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新形势下佛教的基本纲宗。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法音》1983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瞋恚、不邪见),是佛教传统的基本戒条,“四摄”(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种方法摄引众生)、“六度”(施、戒、忍、进、定、慧)是大乘菩萨行的基本内容,“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及建设“人间净土”的词旨,皆出佛经。所谓人间佛教,其实质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实践佛教教义中的修行之道,以净化自心、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它的基本精神,是佛教传统的“佛法在世间”,世间、出世间不二,以离“我执”的出世间心在世间饶益、度化众生的原则。

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还可以从佛教教义中汲取许多内容,诸如牺牲自己救度众生的宏愿,报国家恩、报众生恩、自利利他的思想,慈悲喜舍的精神,福慧双修、重德重智的价值观念,奉行诸善、广种福田的

教诫,广学多闻、掌握“五明”等饶益众生的学问技术的示导,看护病人、扶助老弱、修桥铺路、植树造林等的提倡。这些思想,在当代的佛教徒看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公民提出的“四有”、“五爱”等要求有相通之处,可以指导和促使佛教徒自觉进行人格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人间佛教思想的感召下,广大佛教徒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看作修行的道场,积极发扬佛教倡导的“恒顺众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各项工作中力作贡献,涌现出不少四化建设的先进工作者。如哈尔滨市佛教徒在1988年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10人,市级先进工作者40人,单位先进工作者200人,五好家庭250余户。

佛教徒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更表现在他们发扬佛教慈悲救济、利乐众生的精神,以宗教的热忱,积极从事和资助社会公益、社会福利事业。如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时,《法音》发表题为《积极参加关心帮助残疾人的善举》的评论员文章,号召佛教徒关心赞助残疾人福利事业,中国佛协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5万元,并为基金会募集书画;上海佛协、天台山国清寺等,也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助巨资。上海真禅法师一人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1万5千元,1987年,他又向上海儿童福利院与伤残儿童康复中心捐款1万5千元。1988年,向市儿童福利院捐款10万元,设真禅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人民日报》(海外版)特报导此举。九华山佛协会会长晓悟法师,平时省吃俭用,83、84两年各捐1千元救济灾民、资助残疾人福利事业。浙江苍南瑞岩寺住持慧性法师,自1984年以来捐款3万多元资助各种社会公益事业。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中国佛协、上海佛协各捐助1万元救济灾民。1988年,浙东受台风灾害,天台山国清寺、宁波七塔寺、温州妙果、江心等寺捐

资数万元救灾,明旻法师一人即捐款2万元,宁波七塔寺桂仑禅师尽倾衣钵余资2750元捐助灾区。同年云南震灾,中国佛协及诸山长老共捐款23万元支援灾区。四川新都宝光寺自1981年以来,10年间共拿出69680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在1989年一年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费用即达6万多元。

佛教界遵行《阿含经》等所教诫,特别重视修桥开路、方便交通一类的社会公益事业。1985年,普陀山佛协共出资13万元修建公路、下水道,购置消防车。苏州西园寺出资20万元修广场、停车场、广仁桥。杭州市佛协为维修西湖断桥捐资5万元。1989年,四川梁平双桂堂僧众集资5千元修复双石桥、拱桥。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捐助4千元修桥铺路,浙江玉环县佛教徒近年来铺设路石1万5千余米,修建桥梁、凉亭、路廊。龙潭寺了达法师发起新建中型桥,耗资4万余元,大部分资金为他所募化。《台州报》1984年12月7日曾以《他为乡亲们服务的一生》为题,报导过一个佛教徒王天洪数十年如一日义务修补道路的事迹。

佛教施医施药、救度病苦众生的教诫,在当代佛教界也颇有实践者。如五台山佛协开办佛家医院,由释藏明主治骨科病。福建长乐市佛协、兰州嘛呢寺、成都文殊院等设医疗所,浙江瑞安市佛协所设医疗室,还免费为民治疗。青岛湛山寺设瑜伽功诊所,聘请著名的神慧尼师开展佛教禅功医疗。福州金山寺释提润,有“治癌圣手”之誉,现任街道卫生院院长,驰名国内外。广东海康县莲宗寺住持释宗益,有接骨绝招,解放后共医好600多人,多年来常采药施人,还常煮药茶施人,以治暑病,《湛江日报》1986年曾报导其事迹。《人民日报》在1987年报导过四川南充清泉山释洪范多年热心为人治病的事迹。

近代以来,佛教界还有兴学校、办教育

的风气。解放初期,北京等地还有佛教界、寺庙办的小学、中学多所。近几年来,佛教徒资助教育事业的事又时有出现。如浙江苍南瑞岩寺慧性法师自1984年以来,向雪岩乡中学、宜山幼儿园、温州大学捐款8100元。1985年,武汉归元寺向汉阳区教育局捐助2千元兴办教师福利,还捐献电子计算机一台。1989年,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向天台县城关三小、县灵溪中学捐资6千元。浙江玉环县佛教徒近年来集资万元资助教育。甘肃佛协副会长融开、四川射洪县大悲殿释本永、河北正定临济寺弘川法师等,近年来都曾捐款办学。

栽植树木花果,是佛经中所提倡的一种善行。中国佛寺多在山林,历来有植树护林的传统。解放后,僧尼们更响应政府号召,在寺院内和寺院周围积极植树造林,为绿化祖国、美化环境作出了贡献。在1952年,有慧光、法融两位僧人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建议“绿化全国铁道”,其建议被铁道部采纳。人们不难发现,佛寺内外,大多林木葱茏,环境清幽,这当然是僧尼们精心栽培护理的结果。如天台山国清寺,多年来专门派出管山僧,住茅蓬护林育林,显澄、克刚二僧,在十年内乱中亦坚持护林,与破坏林木的现象作斗争。浙江平阳县碧泉寺僧人近几年来绿化寺周围2500多亩荒山,植树4万多株,还计划再绿化1000多亩荒山。福建连江县海湖寺,几年来植树4万多株,种果树300余株。五台山僧人灵照,解放后一直坚持义务植树,“文革”前十年内共栽树4万5千余株。

“文革”中他被遣回乡,又在家乡义务植树3千余株,“文革”后回山,仍植树不辍。另一僧人能成,自15岁出家后坚持植树不辍,五十年代曾被评为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在山内外种树多不可计。甘肃临洮宝塔寺僧人一清,近几年不顾年老体弱,率领信徒种树1万3千余株。甘肃甘谷天门山僧人本维,从1951年开始率领信徒在寺

周植树，“文革”中他们所植上万株成材树木被砍伐毁坏，十年来他又再次补种，营造保护的林木已达300多亩，每年还采集上千斤树种卖给国家。山西阳平县寿宁寺崇厚、清如师徒十年来管理300多亩山林，栽树万余株，崇厚被评为县劳动模范，赠予金字牌匾。此类事迹，在各地都有不少。

“农禅并举”的传统与现状

佛教本以出家僧众的团体（僧伽）为中心、为代表，释迦牟尼规定，出家僧尼应乞食为生，不营生产，不持金钱，其正业是“一禅（坐禅）二诵（诵念、研习佛经）”或加“三劝化”（讲经说法）。乞食制度，本是根据当时印度民众供养出家修道之士的风气而建立。后来随封建制的形成，帝王臣民的供养，寺院拥有大量庄园奴隶，僧尼渐以坐食租米、信施为生，自不免被不信佛教者视作寄生阶层。寺院经济发达、危及国家财政，是导致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事件的根本原因。僧团的经济基础问题，实际上成了佛教能否适应国情民俗而存在的关键。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僧尼从东晋南北朝起，便大胆突破戒条约束，开创了“农禅并举”的先例。农，谓从事生产以自养，禅，指坐禅习定等修行。农禅并举或农禅结合，即劳动自养与修行相结合，并有在劳动自养中修道修禅的意味。这在禅宗百丈怀海倡导后尤蔚成风气，百丈“一日不作（劳动），一日不食”的作风，树立了农禅结合的典范。农禅结合，是中国佛教界适应中国国情对佛教制度所作的重大改革，它在解决佛教存在的根本问题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寺院某些旧的封建制度废除，促进了佛教农禅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不劳动者不得食，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僧尼也不能例外。从建国初起，佛教界便以农禅结合为佛教在新社会继续存

在的出路，在组织僧尼参加生产劳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树立了成功的样板。十年恢复中，农禅结合的传统也很快恢复，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有了新的改进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中整个社会经济商品化的趋势，和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处于城市和名胜地旅游景点的寺庙，主要“商禅结合”，以与旅游观光有关的服务性营业为主要经济来源，一般都收参观门票，办素斋、招待所、旅游商店、法物流通处等。僧尼有劳动能力者大多在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寺庙雇用居士和社会人士工作。此类寺庙的收入一般相当可观，如四川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等，年收入达百万元以上，不但僧尼生活自给有余，还可用于寺庙修建，及资助佛教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地方有关单位争措寺庙之“油”的现象。

处于农村山野的寺庙，仍多坚持农禅结合、林禅结合或“工禅结合”，出现了不少生产建设的模范寺院。寺庙最多的福建省，在这方面成绩最为突出。如连城中华山性海寺僧众，几年来承包了寺庙周围的油茶林山地3080亩，开垦耕地9亩，还种植杉木、茶、水果等，设缝纫组、砖瓦厂、小卖部、医疗室，发展多种经营，五年来产值达9万元，自养之余，用以修建寺宇，美化环境，安装电灯、电话、自来水管等，使一座不知名的山间小庙成为闽西山区风景优美、初具规模的寺院，被多次评为福建省佛协系统的红旗单位。福安县万寿寺，在1953年便创办了手工业生产车间，改革开放中，僧人增加，生产方式从手工劳动发展为机械操作，生产纸伞、蚊香、肥皂、染色纸等，所产高级名牌卫生香和气体打火机打入了国际市场，年产值从1953年的千余元增至现在的32万余元，七年来共上交税金7万余元，为国家创造了外汇，扩大了再生产的投资，新建了念佛堂、僧尼宿舍。截至1986年，福建省佛协已开了五次寺庙生产经验交流会，据1986年第

五次交流会的统计,参加交流评比的63个寺庙,共有僧尼1133人,耕种田地6784亩,造林面积5398亩,全年总收入115万余元,人均收入1015元。福鼎县灵隆寺僧众采取科学种田,1985年,他们所种杂交早稻亩产达1121斤,被评为福建省的生产标兵。国内著名禅宗道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自1982年恢复寺庙管理体制以来,因地制宜,从事粮、菜、竹木、茶叶等多项农副业生产,经管山林3690余亩,每年粮油蔬菜等获丰收,生活自给有余,1984年僧人均收入达550元。该寺不但生产好,而且利用闲、雨、冬“三余”时间精进禅修,每年冬天举办禅七,农、禅两不误,颇有古代农禅结合的遗风。江苏启东县汇龙念佛堂在开放几年来,办僧尼福利加工厂,生产僧衣、豆制品等,所制僧衣打入国际市场,僧尼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办有安老院奉养老弱病残僧尼,几年来连续被评为县宗教界先进团体,《人民日报》、上海市和江苏省电视台等十几家新闻单位对其农禅结合的成绩作了报道。

寺庙农禅结合,僧尼劳动自养,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既减轻了政府和信众的负担,又提高了僧尼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格价值,还可活跃旅游业,增加国家收入,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佛教两方面来说,无疑都大有好处。千余年来攸关佛教存亡的经济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当然,从佛教教义而言,如何把农、禅两事更好地结合为一体,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佛学与现代文明

近代以来,随科学之昌明,信仰失真,长期以来君临人们思想王国的各种宗教,魅力锐减,无不在从其传统教义中挖掘发挥可与现代文明相符之点,以求适应时势。佛教教义与其它宗教相比,可谓最多与现代文明可能符契之点,从继承文化遗产方面来讲有

其珍贵价值。近几十年来,随科学文化的发展,时而唤起东西方文化人对它的重识。诸如否定神创神宰,主张自净其心、自主其心,认识自心,开发自性潜能而获解脱自在,高唱众生平等、皆有佛性,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与近代无神论思想和当代西方存在主义、第三心理学等人文思潮,易于协调,因而被国外不少学者所肯定,甚而称佛教为“无神论的宗教”;从身、心、境的相互关系尤深层关系观察宇宙人生的“缘起论”的哲学立场,及由此出发的对主体精神净化的高度重视,对于近代文明逐物不返、破坏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弊病,不无启发意义;佛学对心理现象解析之深细,对神通异能现象的揭示,及禅定、瑜伽之学的宏深博大,对当代人体科学来说,蕴含着不少具深刻启发性的思想资料,为广大人体科学研究者、气功爱好者所重视,佛教禅学随气功的普及,广泛深入社会,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重识佛教。至于对佛教及其文化的学术研究,广泛牵涉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中这方面的研究空前活跃,与海外研究者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传达出佛教的有关信息,使越来越多的人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佛教的某些积极思想,通过这些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佛教界弘扬的以人间佛教为纲宗的思想,可以调动教徒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忘我工作;佛教的信仰可满足一部分人精神上的某种深层需要,安定社会人心,起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达到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

然而,佛教毕竟是一个长期在古代封建社会传播,积淀有不少历史消极因素的宗教,无疑有其与社会主义不相协调的成分。

藏文的佛经为何大多是长条形的

洛珠加措

用木刻版印刷术印刷的藏文书籍，无论是佛学经卷，还是天文历算，一律都是长条形的。与其他民族文字的书籍相比，显得别具一格。

藏文书籍所以要印成长条形的，据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藏区，印度、尼泊尔和藏区的僧侣把写在贝叶上的经文带进藏区。由于贝叶叶面相当大，为了携带方便，僧侣们把贝叶剪裁成条，串以绳线，然后用木板一夹，背在身上。这样一来，长途跋涉，就无甚障碍了。二是，到了吐蕃王朝末代国王朗达玛时期，佛教面临毁灭的危险，朗达玛认为佛教是积贫积弱的根源，下令焚毁寺庙，驱逐喇嘛，令其还俗，同时没收焚烧一切佛经书籍。他还故意让很多喇嘛手持弓箭，上山狩猎杀生。僧侣们为了保护佛教典籍，想出了一种绝妙的办法：他们把经卷藏在宽大的袍袖夹层里，上了山，就展书而读。起先人们这样做是为躲避搜查，后来也就形成风俗，喇嘛们和喜爱读书的人往往把书籍放在袖筒里，既碍手碍脚，又还随时都可阅读。此风大盛，从客观上讲，就促成了书籍印刷以长条形为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木刻印刷书籍，版料一般取自桦树。白桦树以直径10厘米左右的为宜，截取之后用作版料，印制出来的书籍自然是长方形的了。

这就是藏文书籍（特别是佛经古籍）为何是长条形状的缘故。

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的阅读习惯，现在某些铅印藏文书也采用这些版式印刷。

中国佛教重死度鬼、偏重出世，忽视现实人生之发达，及与本土多神崇拜的信仰掺杂，教团内的宗派门户等积弊，虽然从本世纪初起便不断受到教内改革派的批判，但毕竟积重难返，在当今也尚未被彻底肃清，形成人间佛教思想完全实践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潮流，寺庙里也出现佛事商品化的现象。一些寺庙出于经济目的，整天经忏佛事，将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湮没于超度死人的饶钹声中，有的青年僧人甚至把出家赶经忏作为赚钱赢利的途径，有的寺庙只着眼于修庙塑像、收受供养，忽视对人间佛教积极宗旨的

弘扬，其宗教形象只限于低层次的礼拜烧香、祈祷菩萨保佑，给人以一种与时代精神不相协调之感。

对此类问题，佛教界已有所重视，在谋求改进，这当然不是容易彻底改变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完全协调，只能是一个不断消除不协调因素的过程，看待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应该是：相信广大佛教徒是生活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绝大多数是爱国爱教的，他们是决定佛教面貌和命运的主流，必然会不断改革教务，发扬优良传统，应时契机，使自己信仰的宗教与时代相协调。